



中国报告·2016

中 短 篇 报 告 文 学 集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

作家出版社



中国报告·2016

中 短 篇 报 告 文 学 集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报告·2016: 中短篇报告文学集 /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编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063-9368-3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7018 号

中国报告·2016 ——中短篇报告文学集

编 者: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责任编辑: 史佳丽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60 千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68-3

定 价: 5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者前言

为了及时、生动地反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涌现的感人事迹，中国作家协会于2016年3月开始，正式组织实施“2016·中国报告”中短篇报告文学专项创作工程，面向全国文学界定向公开征集相关主题的选题及作品。这些作品要求反映在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五大发展理念过程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新气象，讴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

“2016·中国报告”专项工程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文艺报社、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和民族文学杂志社共同承办。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国广大作家的普遍关注、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截至2016年9月，共征集到申报选题500余项。我们于2016年5月和9月组织了两次评审论证会，先后确定两批共35项选题予以资助扶持。除扶持选题外，一批正面描写现实生活的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也被纳入本专项工程，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自4月以来，《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文艺报》等国家级报刊先后刊发“2016·中国报告”作品60余篇。现精选“2016·中国报告”已发表的部分作品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编者

2017年1月

目 录

塘约道路	王宏甲	/1
鸟道	李青松	/45
再访皮村	黄传会	/56
小布的风声	马 娜	/63
为祖国出征	徐艺嘉	/77
水土中国	哲 夫	/95
东方白帽子军团	丁一鹤	/170
我上辈子是中国人	陈 新	/218
诚品在苏州	范小青	/286
面向太湖 春暖花开	李 迪	/302
麦哈穆德和他的糖萝卜	纳莺萍（回族）	/314
寻找师傅	山 哈（畲族）	/335
独龙江帮扶记	余秋尚（傈僳族）	/351
景颇山上新童话	黄 玲（彝族）	/367
戈壁滩上的花城	陈玉福	/375
新疆一粒枣	金岳清	/379
高铁与这个世界（节选）	王 雄	/382
指上的航行	江 子	/392
首草有约	李青松	/401
关于“家+”	陆春祥	/409
永做太行一棵树	高玉昆	/414
龙跃虎门	许 晨	/422
民不能忘	萧雨林	/430
附录一 评论：精炼地讲述中国新故事	李朝全	/438
附录二 “2016·中国报告”已刊发出版作品存目		/441

塘约道路

王宏甲

海，昨天退去。

出现在眼前的山，从天上俯瞰，宛若无数远古征战的帐篷安扎在大地。它不像太行山、神农架或者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连绵不绝，多是一座一座平地而起。好像有一只上帝之手，曾经在这里做游戏，造了这么多小山峰。

这里的山，便是两亿年前海底世界的景观。在这些高度差别不大的群山之间，曾经有许多海底生物在“山”与“山”之间游弋，是两亿年前海底的自然力量造就了这里特有的群山。

我们今天所说的青藏高原，就在那时候出生。它曾是远古的浅海低陆，距今约二三百百万年前开始大幅度隆起，形成今天的“世界屋脊”。最后露出水面的这片海底世界，因无数小山峰耸立于斯，便成为当今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这里是贵州。我没有想过，工业发展滞后的贵州能在信息时代为全国提供什么经验，但是，现在这远山深土是如此生动地教育了我，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世界。

（一）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2015年以来，有关“很多企业关门了”的说法就多起来，2016年更见有文章说“工厂机器沉寂，马路货车渐稀”。有人说，一批外企外资撤离中国，留给中国打工人口的失业震荡不小。还有人描述道：“别小看每月三千元的工资。小小一张工资条的后面，有数百万留守儿童嗷嗷待哺，还有千百万白发苍

苍的空巢老人的殷殷期待……”在这些说法中，失业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与此同时，房价令人吃惊地暴涨，波及各类房租上扬，地下室也不例外。下岗农民工能在城市里等到企业再录用他们吗？能等到撤离中国的外国资本返回来再录用他们吗？

农民工回乡了。

不仅是单枪匹马外出打工的，不少农民夫妻带着孩子在城市打工的也拖家带口回来了。这些年，政府努力使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拥有上学的书桌。现在，他们也回来了。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农民工回来了，还是这片天空，还是这片土地。不少人的地转让给别人种了，或撂荒了。现在干什么，日子怎么过？

多年前，我到洛水上游采访，看到许多“空壳村”，看到公路两侧的墙上刷着大标语“外出打工如考研，既学本领又赚钱”。那是当地政府部门刷出的标语。

曾经，面对“空壳村”，村干部感到无可奈何。现在村民们回来了，党支部能怎样？村支两委能带领村民重建家园吗？

今年，我五次去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叫塘约的村庄，这里前年还是个“榜上有名”的贫困村。我走进他们新建的村委会小楼，看到最醒目的四个红色大字就是：穷则思变。

他们确实在变。他们把改革开放初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全村抱团发展，走集体化的道路，变化和成效皆惊人。我在这里看到了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党的作用、人民的力量。

（二）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

塘约村辖十个自然村，三千三百多口，劳动力一千四百多人，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一千一百多人，青壮年几乎全走了。这是个典型的“空壳村”。

白纸厂寨是村里最低洼的一个寨子，洪水半夜来了，村里多是妇女和老幼病残，寨前的村路被水淹得不见了，二牛从无路的半山踩过去到了寨子，就听见大人的喊声、小孩的哭声。天已微亮，水从后山涌进寨子，从寨子人家的前门里涌出来，村民在慌乱中喊叫着往屋外搬东西。

“别搬了，快往山上撤！”他大声喊道。

几乎没人听他的。

他进了一户姓邱的人家，这家夫妻都是智障，还有个小孩。夫妻俩站在水里发愣。他说：“走啊！”

男的说：“外面下雨！”

他喝道：“屋子会倒啊！”他不听他们说什么都，硬把他们一家拽了出来。

这时他发现村主任彭远科也到了这里，还有两个村委委员也在疏散群众，他们把残疾妇女的一家人弄出来了。

瓢泼大雨还在下。滔滔洪水把衣服、鞋子、灶具、家具、电视机都从前门冲出来了。快六点时，水更大了，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全身浸在水里从屋里出来，人们说他是“游泳出来的”。老人从水里被拉上来，搀扶上山。这时二牛看到，还有一些不是这个寨子的群众也来帮助抢险。

天亮了，部分房屋倒了。现在能清楚地看到寨子前方的土地不见了，一片汪洋般的混浊水面上漂浮着小寨人家的衣物和用具……这是塘约地势最低的一个村，塘约还有九个村在暴雨中，九个村都有危房。

二牛姓左，大名文学，这年四十三岁，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是2014年6月3日，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田也毁了，路也毁了。左文学在暴雨中望着被洪水洗劫的家园，灌满他脑子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受灾的不仅是塘约村。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西部，地处长江水系乌江流域和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有两区一县，还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这场暴雨，使这片土地受灾很广。

6月5日，安顺市市委书记周建琨等人踩着泥泞，来到受灾最重的白纸厂寨，看到几个人正在帮一对残疾夫妻修房子，一问，这几个人都是村干部，是义务帮忙。

“村书记呢？”周建琨问。

“也在帮人修房。”有人马上去叫左文学。

几个妇女围住周建琨哭诉：“啥都没了，粮也泡水了……帮帮我们吧！”

周建琨问：“怎么帮？”

“先帮我们修路！”

男人们出去打工了，女人是村里种田的主力，路没了，她们下地干啥都

难。周建琨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忽然很感动，她们不是要粮要钱，而是说修路。

周建琨正在跟几个妇女说话，村支书左文学来了，浑身沾着泥浆，两眼通红，像一匹狼。

左文学回顾，那天周书记看望了家家都在修房的村民，然后就在受灾现场跟他谈话。

周书记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

左文学愣着，心想什么都没了，前途在哪儿？

周书记说：“我看你这个班子很强。这么大的水，人住得这么散，没死一个人。你们干部了不起！”

左文学还是愣着。

“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周书记又说，“你这里百姓也很不错，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

左文学说村里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不管怎么讲，你要记住，”周书记说，“政府永远是帮，不是包。党支部也一样，要依靠人民群众。”

左文学告诉我，就在这天，他记住了周书记说的“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这句话。周书记说：“妇女讲先修路，好，政府出水泥出材料费，你们出工出力干起来，行不行？”

左文学说：“行。”

周书记接着说：“要致富，你要有思路，有魄力，要敢于踩出一条新路来！你想想怎么干，我下次来，你给我讲。”

左文学告诉我：“那天，周书记走后，我哭了。我一个人，躲起来哭得忍不住。”

我感到他的哭里有内容，大约有很多辛酸的往事涌上来吧，于是就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看到了前途。”左文学告诉我，之前，村里人靠传统农业勉强度日，这场大水把很多农户冲得一贫如洗。是穷到底、困难到底了，大家才重新走上这条全村抱团发展的集体化道路。

（三）左二牛的奋斗史

左文学这天躺进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桶里热水齐腰深，他泡在桶里想

往事想前途。

左文学做过文学梦,可是,读完高中回乡,父亲说,种地吧!家有九亩地,种粮,有饭吃,没钱。年底结婚了,要养家,他必须出去打工。这是1991年初春。他这时的梦想,是赚了钱回到县城开个大超市。

少年时的朋友大多对他那个文绉绉的名字不感兴趣,叫他二牛。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儿,同学都喜欢跟他玩。现在他是跟人出去的,到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搞房屋装修。

“做电工,现学的。”他读过物理,很快学会做电工,但渐渐感到“这不是一条路”。

打工半年多,他带回一千多块钱。

当然也带回来见识。他注意到北京郊区的大棚菜,他想,要是我们那里有大棚,也能在冬天种蔬菜,还能养羊、养猪、养鸡……回到家乡想搞大棚,没资金。他决定种药材,到信用社贷款五百元,去四川眉山引进党参、桔梗、独角莲……回来,播种,搞了两个月,失败了。

决心养猪。最多时养了六十头猪,那时他家前后左右都是猪圈。他还到信用社贷款购置了碾米机、磨粉机、压面机,在家里搞了个粮食加工厂。给村民加工米,对方把糠给他。加工小麦,做成面条,加工费就是糠和麦麸。他逐渐存下了六七万元,被寨子里的人认为是个能人。

养猪前五年是赚钱的,第六年养得最多,一下就亏了。他说:“改革放开了农民手脚,确实没人捆住我的手脚,我可以放手去干了。但是,我深深体会到了,单打独斗很难抵御市场风险。”

不甘心,决定养牛,养了三十头母牛、六头公牛。在整个平坝县(后来改成平坝区)都很出名:“那个养牛的叫左二牛。”

他越来越明白,养猪养牛,都得用头脑养。他发现一群牛中必有一个头牛,众牛都会围绕着它。于是给它脖子上系铃铛,别的牛四处吃草时不会走出牛耳听不到铃铛的范围。他感觉这个范围至少有五十米。他开始梦想搞一个大的养牛场。

养牛得去放牛,他每天带两样东西:雨具和书。他记得初中语文老师彭万师曾对同学们说,你们一生中一定要看看《古文观止》。现在有时间了,他就买来读,读得津津有味。

2000年换届,左文学被村里人选为村主任。乐平镇大屯片区总支书朱玉昌

来村里找他谈话。他说我在养牛，脱不开身。父亲听说后表示，他说了不算，等晚上开个家庭会。

当晚，父亲主持家庭会，问儿媳妇：“这个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干？”

儿媳说：“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从来都没拦着他。”

父亲说：“村干部要付出的，没有你支持，他干不下去。”

儿媳问：“咋支持？”

父亲说：“你就支持他两点：一是他有事，随时要走的，你不能拖后腿；二是有人来找，端椅倒茶要及时，找你吵架，你也必须先倒茶。”

儿媳说可以。

父亲再问二牛什么态度。二牛说牛还在。父亲说：“没必要老想着挣钱。盖多大的房，你只有一张床。你消化再好，一天也是三餐饭。”二牛说：“现实中，没钱也挺难的。”父亲说：“能生活就行了，到我这个年龄，给我钱也没用。”

父亲又说：“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儿事，是福气啊！”

左文学的父亲叫左俊榆，当了三十八年的村支书。

第四天，二牛把牛全部卖了，开始当村主任。这年他入了党，2002年底任村党支部。

塘约村有条河叫塘耀河，河上有座桥，近三十米长，桥面只有一米宽。小孩上学，四个寨子的村民进出都靠此桥。桥面临水很低，雨下大点儿，一涨水就把桥淹了，人就过不去了。生产队散伙后，村里只见个人不见集体，这座桥听凭水淹水落，几十年无可奈何。二牛决心修建一座高大的桥。找上级支持，县里给了六万元，只修了三个桥墩，钱用完了。

桥面没钱做，只好伐木用木板搭起临时的桥面。又去找了三个煤厂的老板化缘，又发动村民捐钱、出工出力，总算把桥建起来了。左文学想，一定要让后代记住这些拿自己的钱做公益事业的人，于是在桥头立了一块“功德碑”，碑上刻着一副对联：众手绘出千秋业，一桥沟通万民心。

当地有煤炭资源，左文学曾想给村里办个煤厂，还想给村里办个木材加工厂，可是没有启动资金，也怕办砸了，不好给全村人交差。直到今天，周书记问他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这话比洪水之夜的电闪雷鸣更让他震撼。

左文学在浴桶里泡了一个多小时，感到有重大的事要发生了。他爬出来，

开始用手机通知“村支两委”全体成员：今晚开会。

一个政府，若无资产就无法管理社会。村是一个小社会，怎么能没有集体资产？村是中国最基层、幅员最广的地方，缺集体经济，村就涣散了，社会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左文学意识到，眼下最重要的事不在修桥或办厂，而是要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抱团发展。

（四）塘约村的十一人干部会

2014年6月5日晚，“村支两委”十一位成员齐聚村委楼。小楼还是改革开放前夕生产大队那时盖的，如今已破旧不堪，屋顶滴滴答答漏雨。

“今天周书记问我：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左文学直接点明了会议主题。

合作社已不是新话题。早先沿海地区出现的那种大户承包，也有外面的老板来承包，雇农民干，种菜的、种果的、养鸡的……这类“专业合作社”，如今贵州也有很多。可是塘约村没有大户，没有谁承包得起。现在路坏了，田坏了，更没有外面的老板来包了。

“我们要成立怎样的合作社？”此刻，这是大家的问题。

“我想好了。”左文学说，“把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把分下去的责任田全部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这可以吗？”会议室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七嘴八舌。穷！这是会上讨论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曹友明等年长的村委说，他们童年时的村庄穷到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真的，”曹友明说，“我小时候还盖过秧被。”

“啥是秧被？”我问。

“就是把插秧剩下的秧苗洗净晒干，用上面绿的编织，下面白的根须软软的，可以贴身。”

我在他们新建的办公楼里试图找回那个夜晚的声音。他们告诉我，家家都有织土布的织布机，穿自己织的土布衣，住茅屋。结婚，“一套新衣一尺红布”，这一套里没有内衣内裤，一尺红布用来盖头。生孩子，烧热水，用剪刀在火里烧一烧剪脐带。没剪刀的用瓷片。没有草纸，孩子生在灰堆里，烧得干干净净的草木灰。

“生病了怎么办?”

“请土郎中。用针刺放血，取老烟斗里的烟油烟垢抹上。拔草药煎喝，用生姜擦太阳穴。”

“大病怎么办?”

“没办法，只有死。”曹友明说这话时很平静。

我接着问，那时候，用钱，从哪里来?

他们说，背柴去城里卖。当地还有煤，背煤去卖。山地坡度大，只能背，去县城要走三个小时。当地有一种土，黏性高，可以烧制砂锅，拿去城里卖。

点灯?点不起。逢年过节，有客人来，办红白喜事才点灯。黑夜很长，没有火柴，用蒿草晒干搓成细绳，山里有一种黑石头，铁匠铺能买到一种小铁片，用这三样东西打出明火。1950年塘约村有了火柴，叫“洋火”，两分钱一盒，家家户户都买得起了……

回到2014年这个夜晚。天上还下着雨，屋顶滴滴答答地漏着，会议室里的讨论在继续。

左文学说：“强强联合，可以使富的更富。强弱联合，强的帮弱的，才能同步小康。这道理是明白的。问题是，你是较强的，你愿不愿意跟弱的联合?”

“可是，你强吗?”有人这样问。大家都听懂了，这是问在座的每个村委委员。

在这漏雨的小楼里开会的十一个委员，一般说，都被村民们看作是村里的能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有打工的奋斗史。村主任彭远科曾经到浙江慈溪打工四年。他们几乎一致的体会是，生产队解体后，确实没有人捆住你的手脚，你有多少本事都可以使出来。他们也确实奋斗了、拼搏了。但是村里没有人靠打工富起来的，反倒是从前一家人团聚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左文学最深的体会是：“单打独斗没出路。”

他们谈到，离乡去打工，你的农民身份就是束缚。青壮年都走了，本村落后的环境缺少人去改造，留在村里耕种的妇女、老人很辛苦，收获很少。

仿佛是一种心中早有的愿望，在这个夜晚苏醒，村委委员们都激动起来了。

左文学讲自己是在浴桶里想啊想，想明白了：“要踩出一条路来，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土地都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什么叫调整产业结构?左文学展开来说，村里出去打工的人里面，搞建筑、跑运输的很多，分散了都看不见。我们可以把回来的人组织起来，搞建筑

公司、运输公司。

这两步，怎么去实现？他说：“我看到有个‘流转’的说法，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说的，农民有承包地经营权，这个经营权可以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说到这里，左文学加大了声音：“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通过流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你们看，行不行？”

大家发言热烈。有人提出疑问：“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

“我想过了，”左文学说，“以前那叫改革，我们这叫深化改革。”

作为过来人，大家都深有体会，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生产队解体后，村里只见个人不见集体，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不村，组不组，家不家。

“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村委们都这样认为，并很快转为积极出主意。有人说，我们干部带头，先去做贫困户的工作，这事就容易做起来。有人提议，先成立一个老年协会，去做老年人的工作。村里多是老年人，看重土地，还在种地的也多是老年人。先把老年人团结起来，很重要。这个建议被大家一致认可。

曹友明被推举为老年协会会长。他当过民办教师、大队会计，还当过平坝信用联社营业部主任，退休后就被左文学请来当“军师”，是塘约村最年长的超龄干部。

左文学肯定了干部带头的意义，接着说：“这件大事还是要村民来定。”

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决定的最后一条写着：“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他从笔记本里把他抄下来的话念给大家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会议最后决定：明后两天做准备工作，第三天上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成立塘约村合作社，把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一事，进行公决。

贵州省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提出同步小康，旨在2020年贵州省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不拖后腿。在塘约村表现为，要同步小康就必须把单家独户的农民从零散的地块里解放出来，实行规模经营、多种经营。这里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在信息时代，仅靠传统农业方式已无法承载农民生计，真正的贫困已日益表现为旧有生产方式的束缚，在改革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五）村民的选择

老年协会是塘约村最年轻的一个组织，因为它刚刚成立。

“塘约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六百二十人。”曹友明说。

采访中我得知，塘约村的老人也多是打过工的，三十多年前，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曾是打工仔、打工妹。那时候，山里父母还多是让男孩在家乡成家立业，被推向市场的多是女孩。一趟趟“盲流专列”把乡下人如集团军般拉到南国的劳务市场，火车到站，汽笛声响得让人心慌。

那以后月尾节初，有打工族的地方，邮局就挤满了他们的身影。把流水线上的劳动所得变成汇款单，寄往贫穷的家乡，被家乡人戏称为“外汇”。谁能说他们没有过青春梦想？可是几十年过去，把汗水洒在东部的许多城市，他们回来了。每个人都比从前更知道哪里是自己真正的家乡。

先去做老人的工作，不是因为难，而是更容易。曹友明喜读古典，他说这符合老子说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从村支两委开过会议的第二天开始，村干部就分头工作。老人协会也开始紧张工作。村民代表怎么产生？每十五户人选一个代表，原则就是：你相信谁就选谁。

2014年6月8日上午，出太阳了。这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十个自然村寨的村民代表，集中到塘约村本部开大会。

会议开始，先由左文学向大家报告，我们村为什么要办合作社，办怎样的合作社。他说，把土地集中后就能统一规划，组建农业生产、养殖、建筑、运输、加工等专业队，将来发展成专业公司。妇女也要组织起来，开展适合妇女的创业。男女都可以在各专业队上班，按月领取工资。另外，村民入股到合作社的土地经营权，可以按每亩一年的约定价领取资产性底线收入，年底还能分红。

为什么现在做这件事？

左文学说，洪水把村路冲坏了，是按老路修，还是拓宽修好一点儿呢？我们想修一条把塘约十个村都连起来的“环村路”！这就要经过一部分人的承包地。如果土地转到合作社，这事就比较好办了。还有一部分田地被水冲毁了，不管冲了谁的，要修复都很难。土地转到合作社后，修复就是集体的事了。

怎样才叫入社？

不是行政命令，也不是简单的报名参加。前提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自愿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给合作社，这个“转”，上面的专家给取了个新名词叫“流转”。大家记住，把土地“流转”到合作社，也就是“入股”到合作社，也就是入社了。

左文学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了一个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左文学讲得明白易懂，一讲完，会场就像开了锅。

最后对是否同意成立塘约村合作社投票公决，参会代表八十六人，全票通过。

土地确权流转，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要对村民承包地重新丈量，登记存档，张榜公示，接受全体村民监督。最后由政府颁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简称“土地确权”。

但是，我这样描述，是远远不够的。

渐渐地，先前也曾耳闻目睹的事，现在以不同的情势在眼前呈现，我问自己：难道没有看见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名目繁多的各种“开发区”几如燎原之火不可遏止，已大大超过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开发区热”，很多农民成为“无地农民”……这是与我们这些非农民无关的事吗？

2013年12月下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公告说，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粮食安全，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会议把这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定为我国粮食安全的底线。

为什么必须守住这条底线？

中国有近十四亿人口，以十八亿亩耕地为底线，人均耕地是一亩二分多。目前中国粮食平均亩产约三百二十公斤，按此计算，一亩二分多耕地的粮食产量约三百八十公斤。以一般人均粮食三百七十公斤计算，十八亿亩耕地也就是中国人的“口粮田”。这条底线一旦破除，大量耕地势必被强势资本圈占，中国的粮食生产就不可能做到自给。

国内外都有人竭力促使中国取消这条耕地红线，论述“在中国种粮不如向国外买粮”。然而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若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岂不是很危险吗？所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再看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定要守住三条

底线。

第一条就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

第二条是要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其含义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巩固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不能随便侵犯农民的承包地经营权。

第三条仍是要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守住这些底线？因为这些底线不断遭到国内外资本的挑战。

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农民的承包地只是得到经营权，这种从承包政策中得到的经营权并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代表着集体”的权力出卖了，名义多是政府征用、发展需要用地，然后转卖到了地产开发商手里。农民拿到一笔钱后，那本属于他经营的土地就不复存在了，也永远失掉了本属于他的土地经营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在土地方面积攒了不少问题，如增加人口不增土地、死亡人口不减土地等。在侵害土地集体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被概括为“四地”问题：一是违约用地，二是违规占地，三是非法卖地，四是暴力征地。

塘约村或因地方穷而偏僻，尚无房地产商涉足，没有非法卖地，也没有暴力征地，但塘约村有违约用地和违规占地。

违约用地，指承包人没有按照责任制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致使土地荒废、农田设施毁坏、土地用途改变等。

塘约村土地撂荒达到百分之三十，这就是没有履行承包职责的违约行为。

由于土地的所有权是农村集体所有，村集体是有权收回撂荒土地的。如果这么做了，在塘约人看来，这是重视土地而忽视人。

村集体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土地确权中，对撂荒的土地丈量后依然确权给承包人，再由承包人自己选择——如何使用确权颁证后的承包地经营权。此举，深得塘约村民之心。这百分之三十撂荒的土地，确权后全部流转 to 村合作社。

如此，塘约村的土地确权，无疑巩固了集体所有制，也保障了每一户村民的承包地经营权，维护了全体村民的利益。

但是，我这样叙述，仍然是不够的。

当今的“确权”和“流转”，出现在我国深化改革的“现在进行时”，与之有关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农民，更不只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当今的专业大户、外来资本，也盯着农村土地确权，也可以成为农村资产“确权”后的“流转”对象。而且，他们比一般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更有资本购买“确权”后的种种权益。